

新史学译丛

二十世纪的历史学

从科学的客观性
到后现代的挑战

格·伊格尔斯摇著
何兆武摇译

辽宁教育出版社

新史学译丛

主编 陈后能 郭少棠

副主编 于沛 姜□

员廉卑则拔兵简降

勻豈舉惡現非表課增蚤切減棄裁憎棄恒棄操悅棄悅則憎

一云舉 奈舊此舊舊的豈棄舊舊則則棄馬棄庭以棄止悅棄舊上棄

勻蘇杜舉則暈勻,宰棄舊舊杜故豈增孕暢灵怨苑

目 录

译者前言

中文版序言

序言与致谢 员

绪论 园

I 早期阶段 历史学作为一种专业规范的诞生 猿

第一章 作为历史学研究典型的古典历史主义 猿

第二章 古典历史主义的危机 源

第三章 德国的经济社会史与历史社会学的滥觞 缘

第四章 社会史学的美国传统 缘

II 中期阶段 社会科学的挑战 猿

第五章 法国年鉴派 源

第六章 批判理论与社会史 联邦德国的“历史社会科学” 愿

第七章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科学 从历史唯物主义到批判
的人类学 愿

III 历史学与后现代主义的挑战	目录
第八章 劳伦斯·斯通与“叙述史学的复兴”	页远
第九章 从宏观的到微观的历史学：日常生活史	页远
第十章 “转向语言学” 历史学之作为一种学术的终结？	页远
第十一章 世纪 年代视角	页远
结束语	页远
注释	页远
推荐阅读书目	页远
索引	页远
附录 美国与德国历史思想中的兰克形象	页远

译者前言

本书作者格奥尔格·伊格尔斯（~~1903—1992~~）是当今美国著名的思想史家和史学史家，原籍德国，~~1931~~年获美国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曾长期在芝加哥大学任教，~~1958~~年起任纽约大学布法罗分校欧洲思想史荣誉教授至今。半个世纪以来，他曾有专著多种和论文多篇问世，且有不少已译为中文。~~1974~~年中文即已译有他的《美国与德国历史学中的兰克形象》一文载《历史译丛》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一期）。~~1982~~年他的《欧洲史学新方向》赵世玲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2~~年）和他的《历史研究国际手册：当代史学研究和理论》陈海宏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2~~年）两书中译本出版。另外，他的《德国的史学观——从赫德尔到当今史学思想史中的民族传统》虽尚未见中译本，但已在西方史学界享誉颇隆。

~~1982~~年伊格尔斯曾以德文写了《二十世纪的历史科学——国际背景评述》一书，在德国哥廷根出版，经张芝联先生推荐，已译为中文出版（《史学理论研究》~~1982~~年第 ~~1—3~~期，~~1982~~年第 ~~1—3~~期连载）。~~1982~~年他又用英文写了一部《二十世纪的历史

学——从科学的客观性到后现代的挑战》，由美国威斯理大学出版社出版。作者自序此书说：“这个英文本并不是德文本的译文，在许多方面它都是另一部著作，是过去三年之中我对德文本进行补充、阅读和讨论以及保持批判的距离所获得的结论。”

去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陈启能兄邀我和他共同译此书，以供我国史学界同人的阅读和参考。在我动笔之后，陈启能兄以工作繁忙不克分身，遂将全书译事委诸我一人承乏。现值全书译竣之际，我要感谢他对本书翻译从始至终的关注和帮助以及与出版社的联系。原作者的前一部书《二十世纪的历史科学——国际背景评述》也是由陈启能兄全权进行组织工作的，我所承担的只是具体业务工作。

原书中所引的参考文献甚多，有一些未能一一找到原文的，只好就字面加以理解。如有错误，尚乞读者加以指正，拜嘉无极。

译者谨识

癸卯年春于北京摇清华园

又 兰克在近代西方史学史上的地位似可方之于牛顿在近代西方科学史上的地位。到了二十世纪两人绝对权威的地位均告动摇。二十世纪 四十年代傅斯年主持建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路数，其意即在师兰克的故智。当时胡适、傅斯年一辈人以为历史学就是史料考据，故有“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的格言。殊不知证据本身是不会说话的，说话的不是证据，而是号称掌握了证据的人。而且“史料即史学”的说法，也是对兰克及其学派的严重误解。兰克及其学派虽然以资料博洽、考据精赅著称，然而他们进行研究的指导思想却是他们内心深处那种

根深蒂固的世界观。不首先深入考察指导他们思想的世界观，则对兰克及其学派的理解仍不免是雾里看花终隔一层。为了理解二十世纪史学思想的十九世纪背景，现将同一作者的《美国 and 德国历史思想中的兰克形象》一文附录于书后，以供关心现代西方史学读者们的参考。

译者附识

中文版序言

我非常高兴,本书在人民共和国即将以中文出版。我非常欣赏中国对我的著作感兴趣。我最初的文章之一《美国和德国思想中的兰克形象》在 1954 年就已经有了中文译文,后来我得知它的翻译者就是本书的翻译者何兆武先生。后来我的《欧洲史学的新方向》1954 年和我与哈罗德·裁·派克合编的《历史研究国际手册》1954 年两书,均于 1955 年在北京出版。多年来我和北京大学张芝联教授有着密切的学术接触,自从 1955 年“历史学的历史与理论”创建以来他一直是该国际委员会的一个活跃的成员,也曾是我在布法罗城的客人。齐世荣教授在 1955 年有六个月作为我系布法罗城的访问教授,也是我的同事。反过来,我的妻子和我在 1955 年也有六个半星期在北京师范学院(今首都师范大学),作他的客人,当时我还在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南京大学作过讲演。我在布法罗城有过几个中国学生:王晴佳成了我的好友,我和他在有关比较历史学的题目上一直密切合作。邵立新来自北京,他为我写过一篇关于中国接受尼采的论文。还有周桂楷来自台中,他写过美国劳工历史学。我对

于中国历史学家的著作日愈感到兴趣,无论是古典的还是当代的,尽管不幸的是我不能阅读中文而必须依靠翻译。过去五年内,我积极参与了一项《中国文学与比较史学》的国际项目,我期待着在 1995 年夏季再次访问中国,届时我希望能讨论此书的题材,并且也能学习到我所考察的当代欧洲和北美的历史学思想和著作曾经是怎样引用于中国的问题。

本书所探讨的关键问题是后现代主义向严谨的历史学所提出的挑战。本书是 1989 年我在费城关于《合理性及历史》这个题目所做的一次讲话的扩充。另外两位小组讨论发言人迈克尔·穆莱和列泽克·柯拉可夫斯基都认为从事合理性的探讨以及客观性,乃是属于已告结束的那个近代时期的一种幻觉。穆莱从一种海德格尔式的立场出发,宣称启蒙运动的事业及其对于某一种主义的真实性的信念——它是可以被理解的,并且在某种限度之内是被人类的智慧所塑造的,为人间的和人道的目的而服务的,——已经破产了。柯拉可夫斯基在波兰开始他的思想工作时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者,也抱有这种幻灭感,但是他力争以回归到宗教性——它先行于并且继续着自从希腊的古代以来就塑造了西方思想的理性主义和人本主义——来对一个已经丧失了一切幻觉的时代重新建立稳定性和意义。我在我的讲话里是维护一种经过了提炼的启蒙运动。我承认麦克斯·霍克海默和提奥多·阿多尔诺所称之为的“启蒙运动的辩证法”,那么企图克服神话和野蛮主义时,却培养出了新的神话和一种在科学上是十分完美的野蛮主义。然而同时我也在维护为着一个适宜于生活的文明世界所必须的那种

人道与理性的因素。

这本小书是我在费城所作的那次讲话中的思想的发挥。我想要考察,近来的各种讨论曾经怎样地在实际上影响了实践的历史学家们的工作。因而本书就取代了我早先在《欧洲史学的新方向》一书中对二十世纪史学思想和著作的论述。但它并不只是对前书的修印和补充而已。在过去的二十五年来,在历史研究中发生了很多的事。前书对于近代历史学的讨论截止于二十世纪 30 年代的初期,当时对历史学作为基于经验的与分析的社会科学之上的一门高度技术化的学术的可能性,具有着很大的信心。‘年鉴派’历史学家们、计量史学家们和马克思主义者都沿着同一个方向在行动,尽管他们的社会政治观点不同。他们大家都以自己已经克服了自从兰克以来史学家们把叙事的焦点集中在左右了历史学的伟大事件、人物和思想上的那种狭隘的局限性而感到自豪。然而随着增加的问题变得日愈明显和自从启蒙运动以来西方社会所依靠的那些乐观的假设受到了挑战,他们对科学、进步和现代性的信仰从二十世纪的 30 年代以后已经极大地动摇了。所有这一切都表现在历史编纂学的方法上,它从精英们的身上转移到居民中的其他部分,从巨大的非个人的结构转移到日常生活的各种现实的方面,从宏观历史转移到微观历史、从社会史转移到文化史。对冲突的看法也不相同了,它从一种更为非个人的层次出发,而不再像它以前的兰克的势力均衡或马克思的阶级冲突那样宏伟的概念了。性关系与性能力,成为历史生活中的重要内容。所有这些都包含着新的研究战略,它更少依赖于传统的经济学、社会学和政治科学而更多依赖于人类学、语言学和符号学。因此本书就必须从以前那部

书已告中止的地方入手。但是对新趋势的考察也需要格外关注并批判晚近的历史学所依赖的理论前提。比起一份概述来,本书更其是一篇展开来的论文,它比前一部书更加有意识地提出一种对后现代主义的立场易于接受的、而同时又是批判的观点。后现代的思想家们从罗兰·巴尔特(1903—1980)到海登·怀特(1927—)、米歇尔·福柯(1928—1984)和雅克·德里达(1923—1989)关于科学合理性的界限以及高度评价科学与合理性的地方文明的性质,都曾提出过许多重要的问题。然而他们不再看到历史学与想像的文学之间有区别的那种极端的认识论上的相对主义,却是不可能的。历史学家在过去的三十年之中已经探索了新的地带和新的战略;他们已经改变了要献身于严谨的研究来如实地重建历史的过去。后现代主义的挑战,其意义并不在于历史学的研究而在于更加精深的辩论。

本书的最初德文本(1987年出版)于1991年出版,中文翻译为一系列的论文刊登于《史学理论研究》上。目前这部书,出版于四年以后;它不是德文本的译本,而是重新改写过并增补过的。

最后,我谨表示我对张芝联教授、王晴佳教授、陈启能教授和译者何兆武先生使得本书能达到中国读者之前的特别感谢之忧。

格奥尔格 耶伊格尔斯
美国纽约州布法罗城
1995年十一月

序言与致谢

本书的德文本出版于 1984 年,同时已被译为中文^①、日文和西班牙文。德文本是以 1980 年四月我在“费城哲学讨论会”
~~《历史哲学》杂志上发表的论《合理性》一文为基础的,文中探讨了后现代主义对历史研究挑战的问题。目前这个英文本并不是德文本的译文,在许多方面都是另一部著作,它是过去三年间我对德文本加以补充阅读和讨论以及保持批判的距离所获得的结论。~~上所发表的论《合理性与历史》一文为基础的,文中探讨了后现代主义对历史研究挑战的问题。目前这个英文本并不是德文本的译文,在许多方面都是另一部著作,它是过去三年间我对德文本加以补充阅读和讨论以及保持批判的距离所获得的结论。

有两点声明:尽管本书试图要对国际范围上的历史思想作一番比较考察,但它只限于我所能阅读的语种。因此焦点就聚在大不列颠和北美、法国和比利时、德语中欧和意大利,偶尔也提到波兰和俄国著作的译本。然而哪怕就在这些地区,我挑出来的作者们也必定是高度有选择性的,焦点主要是集中在那些可以阐明历史学研究的重要趋势的历史学家们的身上。

① 中译文《二十世纪的历史科学》连载于《史学理论研究》1985 年第 1 期,1986 年第 2 期。——译注

[illegible]

小书,书中我说明了学术研究的传统形式是怎样地被更新颖的历史研究形式所取而代之的。^①所有国家的历史学家们大抵都同意,自从十九世纪初期国际上就开始作为一种专业规范在运用着的那种历史研究方式,已经是既不符合二十世纪下半叶的社会政治状况,也不符合现代科学的要求了。同时,有关历史的和历史学的观念,也经历了深刻的变化。因此,本书不应该看做是一部续编,即——可以说是——要把我 ~~过去~~ 几十年的著作写到今天。反之,它主要地是涉及从当今历史学家们思想中和实践中所挑选出来的某些基本变化。尽管有许多旧式的历史研究和历史写作的形式还在继续着,然而已经发生了一场基本的重新定向。

在过去的二十年中,自从十九世纪以历史学作为一种专门学术的出场为其基础的那种历史学的研究与写作的种种假设,就日愈受到了人们的质疑。有许多这类假设都要追溯到西方历史学从古典古代一直延续下来的那个传统的开端。十九世纪的新事物则是历史研究的专业化及其集中到大学里和研究中心里。而成其为专业化的核心的,则是对历史学的科学地位的坚定信念。历史学家所理解的“科学”这一概念,肯定地是与自然科学家所理解的大不相同,自然科学家追求的乃是概括化与抽象定律的形式的知识。对历史学家们而言,历史不同于自然,因为历史学处理的乃是表现为创造了历史的男男女女们的意愿以及使社会得以凝聚的种种价值和风尚。历史学处理的是在时间中的具体的人和具体的文化。然而历史学家们一般地也都在分享各种专业化科学的那种乐观主义,亦即受控的研究在方法论上就使得客观的知识成为了可能。对于历史学家们也像对其他

科学家们一样：真理就在于知识与客观实际相符合。那对于历史学家而言便是“要像它实际上所发生的那样”^②建构过去。历史学这一自我界定之作为一种科学规范，对于历史学家的工作就蕴涵着科学话语与文艺话语、专业历史学家与业余爱好者双方之间的严格区分。历史学家们忽视了事先就在决定着他们研究结果的那些有关历史行程与社会结构的各种假设。

然而，历史学之转化为一种制度化了的规范，却决不可引导我们忽视古老的历史写作形式的连续性。十九世纪的历史学是处于要上溯到古典希腊古代的伟大历史学家们的那种传统之中的。他们和修昔底德一起分享着对于神话与真实的分野，同时尽管他们强调历史著作之科学的、因而是非修辞学的特性，但却循着历史写作的古典传统在前进着，在设想历史总是作为一种叙述而被写下来的。然而正如海登·怀特《~~历史与文学~~》^③和最近其他一些史学理论家已经指出了的，历史叙述的问题就在于：虽说它是由经验所认定的事实或事件出发的，它却必然地需要有想象的步骤来把它们置于一个完整一贯的故事之中。因此，虚构的成分就进入到一切历史的话语之中。

因此，十九世纪“科学的”的历史学和古老的历史学的文艺传统之间的断裂，一点也不像许多十九世纪的历史学家们所设想的那样大。“科学的”历史学话语就包含有文学的想像在内，而古老的文学传统也是在重建真实的过去之中寻找真理的。自从利奥波尔德·冯·兰克以来，“科学的”取向就和从修昔底德到吉朋的文学传统共有享有三项基本的前提：员 他们都接受了真理的符合论（~~认为历史学是描述过去发生的事~~），认为历史学是描绘确实存在过的人和确实发生过的事。圆 他们都假设人